



2013年12月30日,在学院“校园风尚人物”评选表彰晚会上,刘志涛同志被评选为“校园风尚人物”。刘志涛同志在学院“校园风尚人物”评选表彰晚会上,刘志涛同志被评选为“校园风尚人物”。刘志涛同志在学院“校园风尚人物”评选表彰晚会上,刘志涛同志被评选为“校园风尚人物”。

刘志涛同志是河北政法职业学院第一批招聘辅导员,法律系团总支副书记。2001年到学院工作以来,她默默无闻,吃苦耐劳,从无怨言,深受师生们的爱戴,多次被评为省直属级优秀团干部,优秀辅导员。2013年暑假期间,刘志涛同志诊断出胃癌

并进行了胃切除手术,胃部已切除三分之二。癌症初期切除属重大手术,抵抗复发和预防各种并发症的治疗十分复杂,花费巨大。刘志涛一直瞒着身患癌症的母亲和长年卧病在床的姥姥,幼小的女儿正在读书,家庭经济十分拮据,无力支付巨额医疗费用。

得知病情后,法律系领导第一时间赶往慰问。在刘志涛做手术当天,法律系的老师一直守护在手术室外。住院期间,老师和同学们有的帮助联系医院,有的陪床、送饭。学院领导对刘志涛同志的病情十分关注,王春晓院长、吴章军书记分别亲自到病中看望。

2013年暑假期间,许多学生(包括已毕业的、没有毕业的,刘志涛同志所在班的、不是她分管班的)得知病情后,匆忙从保定、秦皇岛、邯郸、邢台等地赶来看望,帮助照顾孩子,住的一个半月,使刘志涛同志在病魔面前,婚姻一结束,就带着新婚妻子前来看望;那些曾经在一起工作过的同事,甚至没在一起共过事的老师也都打电话或到家里探望。

除了精神上的鼓励,大家还在物质上给予她更大的帮助。法律系组织教职工捐款(一万九千多万元),院工会上申请直一日捐经费,院团委开学后马上召集各团总支书记通报情况,发出倡议书,号召大家自愿捐款,有的团干部一次性捐出1000元,有的团员捐10元、20元,会计系、财经系捐款超过一万元。……各团总支组织全院青年团员团干部共募捐近五万元,最终全院师生共捐助106150元。法律系在座的毕业生还自发在网上组织募捐,并由学生干部代表送到刘志涛同志手中。

刘志涛同志对广大师生的关怀十分感动,在家人休养期间,她每天十几个电话安排班里工作,惦记着同学们。手术后只休息了一个月就来到单位,要求上班。重返工作岗位后,在医生的指导下多休息,拖着留下16针的刀口的身体走路都很费劲,一顿饭只能吃200毫升的流食,却要面对每天二三十个学生电话,各种琐碎的工作,学生实习证明盖章、学生请假、打印学生考试成绩单、交各种表格……同事们“看不下去”“你别这么操心”。如今,手术已经过去大半年多,她依然保持着每天7点出门,7点45分到校,如果班里有课,先去班里,看看出勤情况,没来的学生问明情况,回到办公室做一些事务性工作,等课间各班班长汇报工作……就这样,每天都忙忙碌碌,却没有任何一点委屈和抱怨,一直到25点下班,离开学校,手机仍要24小时开机,200多名学生都有她手机号,确保学生一旦有特殊情况第一时间能找到她。

2014年3月10日,《燕赵都市报》刊发了以“汉子辅导员带病坚守岗位”为题的对刘志涛同志专访。在文章中,刘志涛说:在我最困难最脆弱的时候,是学院同事们学生伸出援手帮助我,鼓励我。我第一次发觉语言是如此苍白,再多的词汇也无法表达我内心的感动……我只能深深的把你我的恩情铭记在心!2014年2月28日,河北“播网”《有事找涛姐》——爱岗敬业的高校辅导员刘志涛》也编发了此事。

通过这件事,充分证明了政法职业学院全体师生风雨同舟、荣辱与共的精神风貌,政法精神确实存在。近一两年来,在捐助骨髓救人的张珊珊、到省送到学院救助的杨莉青,再到举动车院师生心灵的刘志涛,这种积极健康的集体主义精神,是最宝贵最珍贵。经历这件事,学院会进一步完善教育和管理体系,爱,教育不是一句空话,更不仅仅是一种情感。这是一种永不过时的工作方法、工作原则。学院各系部,广大教工既要传承好政法精神,更要充分利用好身边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,教育引导我们的老师、辅导员、团干部,发扬和实践正能量,真正以自己能做好工作,为实现高校管理层面上的内涵发展做出新贡献。

胜任愉快

四说其实做到「德」并不难

管理系 李君奇

他,是件很幸福的事情。用柏拉图对美德和幸福的理解来说,就是顺应了人的灵魂的顺序,使灵魂处在了正义和幸福状态。

柏拉图认为,幸福就是灵魂的和谐状态。人的灵魂具有理性(理智)、激情(冲动)和欲望三个部分,与此相应,也有智慧、勇敢和节制三种美德。理性居于头脑,指挥全身;激情居于胸部,受理性支配;欲望居于腹部,受理性与激情的支配。当这三种因素在理性的支配下各司其职,协调一致时,才是灵魂的正义状态。当激情从理性支配时,就有了勇敢的美德;当欲望从理性支配时,就有了节制的美德;当知识从理性的支配时,就有了智慧的美德;当灵魂的三个部分都服从于理性的支配时,就有了最高的正义美德,而人一旦拥有了正义美德,同时也就有了其他三种美德。

中国的文化中,有“内圣外王”之说。冯友兰先生认为,这世界上有各种人,每一种人都有一种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。从政治上说,人有可能成为大政治家;从事艺术的人,有可能成为大艺术家。但是职业上的成就,不等闲作为一个人的成就。专就人本身来说,最高成就应该是什么呢?中国主流哲学家的答案是内圣外王。内圣,是指修养的高度;外王,是指人的社会功用。只有具备最高精神成就的人,才是最适合为王。(冯友兰《中国哲学简史》)据韩国现任总统朴槿惠据此反思、分析了过去的灾难——给韩国带来经济飞跃的父亲(韩国前总统朴正熙——笔者注),为何不受国民拥戴?……他有积极的社会功用,修养却没有达到足够的高度,不足以服众。***躬自厚而薄责于人,则远怨矣。*责之愈急,怨之愈深,父亲之刺,大概因此于此!”朴正熙当政时,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,对工人施与恩惠;一方面极力压制言论自由,打击异己。他主持建造了韩国第一条高速公路,却拘捕杀害数万知识分子和反对派。被刺杀的当晚,他因为“严厉指责报馆部部长工作不力,导致部长恼羞成怒掏枪射击”。(朱世华《朴槿惠:冰天雪地里的帝王》)

其实,这也就是古今一直在讲的德、才问题。只有德才兼备,才能够使人真正胜任一项任务或工作。即使他不喜欢做某项任务或工作,即使他尚未学到从事这项任务或工作的技能,但是,只要他有责任心,有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精神,最终他会胜任这项任务或工作的,甚至会成为行业里手。否则,尽管有高超之才,但是,如果无德的辅佐,是不可能胜任愉快的。这样的例子和教训不可谓不多。有一本书记《医生当心啊——中国医疗警示录》(陆君、王和平),共收集了100个典型医疗官司。这些案例多与医术高明的医务人员粗心大意,不认真和责任缺乏职业道德相关,譬如误诊误治、输血不当、手术切除,张冠李戴,或将止血钳、止血钳、手术纱布落在了患者体内,切阑尾没切掉,胃胃部手术切掉了脾,病在右腿却给左腿做了手术,等等。在司法、执法领域,因职业操守丧失所引发的冤案错案也不少,典型案例如年初刚刚平反的“浙江叔侄强奸案”。仇仇此案的盛淑芬,是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,身上头衔“荣誉三等功、二等功、三等功”2次,曾被评为浙江省“三八”红旗手、省刑侦行家、杭州市“三八”红旗手。有“女神探”之称。她就是这样技艺高超的能人却制造了这起冤案。

古人早就说过:“德不配其任,其祸必酷;能不称其位,其殃必大。”(东汉·王符《潜夫论·忠孝》)德性和所任的职位不相称,带来的祸害一定很残酷;才能和所在的位置不相称,带来的灾祸一定很巨大。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,德性、谋其政,必能修其德,养其才。无德无才而居其位,只会殃及自身,甚至祸国殃民。只有德才兼备,才能有责任之德,能做事还要有容人之量。所以,对于工作的胜任,既既己又利

他,是件很幸福的事情。用柏拉图对美德和幸福的理解来说,就是顺应了人的灵魂的顺序,使灵魂处在了正义和幸福状态。

柏拉图认为,幸福就是灵魂的和谐状态。人的灵魂具有理性(理智)、激情(冲动)和欲望三个部分,与此相应,也有智慧、勇敢和节制三种美德。理性居于头脑,指挥全身;激情居于胸部,受理性支配;欲望居于腹部,受理性与激情的支配。当这三种因素在理性的支配下各司其职,协调一致时,才是灵魂的正义状态。当激情从理性支配时,就有了勇敢的美德;当欲望从理性支配时,就有了节制的美德;当知识从理性的支配时,就有了智慧的美德;当灵魂的三个部分都服从于理性的支配时,就有了最高的正义美德,而人一旦拥有了正义美德,同时也就有了其他三种美德。

中国的文化中,有“内圣外王”之说。冯友兰先生认为,这世界上有各种人,每一种人都有一种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。从政政治上说,人有可能成为大政治家;从事艺术的人,有可能成为大艺术家。但是职业上的成就,不等闲作为一个人的成就。专就人本身来说,最高成就应该是什么呢?中国主流哲学家的答案是内圣外王。内圣,是指修养的高度;外王,是指人的社会功用。只有具备最高精神成就的人,才是最适合为王。(冯友兰《中国哲学简史》)据韩国现任总统朴槿惠据此反思、分析了过去的灾难——给韩国带来经济飞跃的父亲(韩国前总统朴正熙——笔者注),为何不受国民拥戴?……他有积极的社会功用,修养却没有达到足够的高度,不足以服众。***躬自厚而薄责于人,则远怨矣。*责之愈急,怨之愈深,父亲之刺,大概因此于此!”朴正熙当政时,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,对工人施与恩惠;一方面极力压制言论自由,打击异己。他主持建造了韩国第一条高速公路,却拘捕杀害数万知识分子和反对派。被刺杀的当晚,他因为“严厉指责报馆部部长工作不力,导致部长恼羞成怒掏枪射击”。(朱世华《朴槿惠:冰天雪地里的帝王》)

其实,这也就是古今一直在讲的德、才问题。只有德才兼备,才能够使人真正胜任一项任务或工作。即使他不喜欢做某项任务或工作,即使他尚未学到从事这项任务或工作的技能,但是,只要他有责任心,有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精神,最终他会胜任这项任务或工作的,甚至会成为行业里手。否则,尽管有高超之才,但是,如果无德的辅佐,是不可能胜任愉快的。这样的例子和教训不可谓不多。有一本书记《医生当心啊——中国医疗警示录》(陆君、王和平),共收集了100个典型医疗官司。这些案例多与医术高明的医务人员粗心大意,不认真和责任缺乏职业道德相关,譬如误诊误治、输血不当、手术切除,张冠李戴,或将止血钳、止血钳、手术纱布落在了患者体内,切阑尾没切掉,胃胃部手术切掉了脾,病在右腿却给左腿做了手术,等等。在司法、执法领域,因职业操守丧失所引发的冤案错案也不少,典型案例如年初刚刚平反的“浙江叔侄强奸案”。仇仇此案的盛淑芬,是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,身上头衔“荣誉三等功、二等功、三等功”2次,曾被评为浙江省“三八”红旗手、省刑侦行家、杭州市“三八”红旗手。有“女神探”之称。她就是这样技艺高超的能人却制造了这起冤案。

古人早就说过:“德不配其任,其祸必酷;能不称其位,其殃必大。”(东汉·王符《潜夫论·忠孝》)德性和所任的职位不相称,带来的祸害一定很残酷;才能和所在的位置不相称,带来的灾祸一定很巨大。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,德性、谋其政,必能修其德,养其才。无德无才而居其位,只会殃及自身,甚至祸国殃民。只有德才兼备,才能有责任之德,能做事还要有容人之量。所以,对于工作的胜任,既既己又利

前面说过,德就是顺应自然、社会和人类客观规律去做事;无论一点儿说,就是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。冯友兰先生说,德就是“就其所居之位,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。作为一个社会人,要做与自己身份的(也就是“所居之位”)相符(即“应该做的”)的事情,就应该尽到做人、尽责、为人之德。如果不能尽责、尽德,显然是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,起码是没有做到或没有做好“自己应该做的事情”。所以,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,“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,并非只是做或做了即可,更重要的是必须要做好。

对于此,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早就给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“胜任愉快”。把这么好的一个成语和酷吏放在一起,确实有点儿不般配,但是,司马迁有马迁的理由,估计他也没有想到后人会那么看重它。在中国历史上,司马迁首先为酷吏立传的先例,认为汉景帝时期,“吏治若救火拯溺,非徒酷吏酷,能胜其任而愉快乎!”意思是说,要想扭转当时的局面,只有酷吏才有可能胜任其职。所谓酷吏,各有优劣,“其廉者足以表仪,其污者殆酷道也。”一切奸邪,亦质有文武焉。虽酷,称其位矣。”就是说,其中清廉的足以作为表率,其中污浊的或有战略教化,或果敢镇压奸恶,也有文武方略之分。他们虽然残酷,但是都能称职尽责。所以,他才为酷吏立传。

胜任愉快,是指有能力担当某项任务或工作,并能以此为快乐,将其做好。也就是孔子说的:“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(《论语·雍也第六》)喜爱的比不上以此为乐趣的。担当一项任务或工作,首先要称职,然后还要以此为乐,只有这样才可能越做越快乐,乐此不疲。试想如果是一个不喜欢做这件事情能做一件事情而不痛苦,那么这是做好不这件事情的,更不可能胜任其事。只有以此为乐的人,才能够顺应自然和人之真善美的本性用心地去做这件事情,必然也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普遍的快乐。所以,对于工作的胜任,既既己又利

前面说过,德就是顺应自然、社会和人类客观规律去做事;无论一点儿说,就是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。冯友兰先生说,德就是“就其所居之位,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。作为一个社会人,要做与自己身份的(也就是“所居之位”)相符(即“应该做的”)的事情,就应该尽到做人、尽责、为人之德。如果不能尽责、尽德,显然是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,起码是没有做到或没有做好“自己应该做的事情”。所以,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,“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,并非只是做或做了即可,更重要的是必须要做好。

对于此,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早就给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“胜任愉快”。把这么好的一个成语和酷吏放在一起,确实有点儿不般配,但是,司马迁有马迁的理由,估计他也没有想到后人会那么看重它。在中国历史上,司马迁首先为酷吏立传的先例,认为汉景帝时期,“吏治若救火拯溺,非徒酷吏酷,能胜其任而愉快乎!”意思是说,要想扭转当时的局面,只有酷吏才有可能胜任其职。所谓酷吏,各有优劣,“其廉者足以表仪,其污者殆酷道也。”一切奸邪,亦质有文武焉。虽酷,称其位矣。”就是说,其中清廉的足以作为表率,其中污浊的或有战略教化,或果敢镇压奸恶,也有文武方略之分。他们虽然残酷,但是都能称职尽责。所以,他才为酷吏立传。

前面说过,德就是顺应自然、社会和人类客观规律去做事;无论一点儿说,就是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。冯友兰先生说,德就是“就其所居之位,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。作为一个社会人,要做与自己身份的(也就是“所居之位”)相符(即“应该做的”)的事情,就应该尽到做人、尽责、为人之德。如果不能尽责、尽德,显然是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,起码是没有做到或没有做好“自己应该做的事情”。所以,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,“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,并非只是做或做了即可,更重要的是必须要做好。

对于此,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早就给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“胜任愉快”。把这么好的一个成语和酷吏放在一起,确实有点儿不般配,但是,司马迁有马迁的理由,估计他也没有想到后人会那么看重它。在中国历史上,司马迁首先为酷吏立传的先例,认为汉景帝时期,“吏治若救火拯溺,非徒酷吏酷,能胜其任而愉快乎!”意思是说,要想扭转当时的局面,只有酷吏才有可能胜任其职。所谓酷吏,各有优劣,“其廉者足以表仪,其污者殆酷道也。”一切奸邪,亦质有文武焉。虽酷,称其位矣。”就是说,其中清廉的足以作为表率,其中污浊的或有战略教化,或果敢镇压奸恶,也有文武方略之分。他们虽然残酷,但是都能称职尽责。所以,他才为酷吏立传。

胜任愉快,是指有能力担当某项任务或工作,并能以此为快乐,将其做好。也就是孔子说的:“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(《论语·雍也第六》)喜爱的比不上以此为乐趣的。担当一项任务或工作,首先要称职,然后还要以此为乐,只有这样才可能越做越快乐,乐此不疲。试想如果是一个不喜欢做这件事情能做一件事情而不痛苦,那么这是做好不这件事情的,更不可能胜任其事。只有以此为乐的人,才能够顺应自然和人之真善美的本性用心地去做这件事情,必然也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普遍的快乐。所以,对于工作的胜任,既既己又利

前面说过,德就是顺应自然、社会和人类客观规律去做事;无论一点儿说,就是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。冯友兰先生说,德就是“就其所居之位,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。作为一个社会人,要做与自己身份的(也就是“所居之位”)相符(即“应该做的”)的事情,就应该尽到做人、尽责、为人之德。如果不能尽责、尽德,显然是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,起码是没有做到或没有做好“自己应该做的事情”。所以,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,“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,并非只是做或做了即可,更重要的是必须要做好。

对于此,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早就给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“胜任愉快”。把这么好的一个成语和酷吏放在一起,确实有点儿不般配,但是,司马迁有马迁的理由,估计他也没有想到后人会那么看重它。在中国历史上,司马迁首先为酷吏立传的先例,认为汉景帝时期,“吏治若救火拯溺,非徒酷吏酷,能胜其任而愉快乎!”意思是说,要想扭转当时的局面,只有酷吏才有可能胜任其职。所谓酷吏,各有优劣,“其廉者足以表仪,其污者殆酷道也。”一切奸邪,亦质有文武焉。虽酷,称其位矣。”就是说,其中清廉的足以作为表率,其中污浊的或有战略教化,或果敢镇压奸恶,也有文武方略之分。他们虽然残酷,但是都能称职尽责。所以,他才为酷吏立传。

前面说过,德就是顺应自然、社会和人类客观规律去做事;无论一点儿说,就是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。冯友兰先生说,德就是“就其所居之位,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。作为一个社会人,要做与自己身份的(也就是“所居之位”)相符(即“应该做的”)的事情,就应该尽到做人、尽责、为人之德。如果不能尽责、尽德,显然是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,起码是没有做到或没有做好“自己应该做的事情”。所以,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,“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,并非只是做或做了即可,更重要的是必须要做好。

对于此,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早就给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“胜任愉快”。把这么好的一个成语和酷吏放在一起,确实有点儿不般配,但是,司马迁有马迁的理由,估计他也没有想到后人会那么看重它。在中国历史上,司马迁首先为酷吏立传的先例,认为汉景帝时期,“吏治若救火拯溺,非徒酷吏酷,能胜其任而愉快乎!”意思是说,要想扭转当时的局面,只有酷吏才有可能胜任其职。所谓酷吏,各有优劣,“其廉者足以表仪,其污者殆酷道也。”一切奸邪,亦质有文武焉。虽酷,称其位矣。”就是说,其中清廉的足以作为表率,其中污浊的或有战略教化,或果敢镇压奸恶,也有文武方略之分。他们虽然残酷,但是都能称职尽责。所以,他才为酷吏立传。

前面说过,德就是顺应自然、社会和人类客观规律去做事;无论一点儿说,就是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。冯友兰先生说,德就是“就其所居之位,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。作为一个社会人,要做与自己身份的(也就是“所居之位”)相符(即“应该做的”)的事情,就应该尽到做人、尽责、为人之德。如果不能尽责、尽德,显然是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,起码是没有做到或没有做好“自己应该做的事情”。所以,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,“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,并非只是做或做了即可,更重要的是必须要做好。

对于此,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早就给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“胜任愉快”。把这么好的一个成语和酷吏放在一起,确实有点儿不般配,但是,司马迁有马迁的理由,估计他也没有想到后人会那么看重它。在中国历史上,司马迁首先为酷吏立传的先例,认为汉景帝时期,“吏治若救火拯溺,非徒酷吏酷,能胜其任而愉快乎!”意思是说,要想扭转当时的局面,只有酷吏才有可能胜任其职。所谓酷吏,各有优劣,“其廉者足以表仪,其污者殆酷道也。”一切奸邪,亦质有文武焉。虽酷,称其位矣。”就是说,其中清廉的足以作为表率,其中污浊的或有战略教化,或果敢镇压奸恶,也有文武方略之分。他们虽然残酷,但是都能称职尽责。所以,他才为酷吏立传。

前面说过,德就是顺应自然、社会和人类客观规律去做事;无论一点儿说,就是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。冯友兰先生说,德就是“就其所居之位,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。作为一个社会人,要做与自己身份的(也就是“所居之位”)相符(即“应该做的”)的事情,就应该尽到做人、尽责、为人之德。如果不能尽责、尽德,显然是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,起码是没有做到或没有做好“自己应该做的事情”。所以,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,“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,并非只是做或做了即可,更重要的是必须要做好。

对于此,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早就给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“胜任愉快”。把这么好的一个成语和酷吏放在一起,确实有点儿不般配,但是,司马迁有马迁的理由,估计他也没有想到后人会那么看重它。在中国历史上,司马迁首先为酷吏立传的先例,认为汉景帝时期,“吏治若救火拯溺,非徒酷吏酷,能胜其任而愉快乎!”意思是说,要想扭转当时的局面,只有酷吏才有可能胜任其职。所谓酷吏,各有优劣,“其廉者足以表仪,其污者殆酷道也。”一切奸邪,亦质有文武焉。虽酷,称其位矣。”就是说,其中清廉的足以作为表率,其中污浊的或有战略教化,或果敢镇压奸恶,也有文武方略之分。他们虽然残酷,但是都能称职尽责。所以,他才为酷吏立传。

前面说过,德就是顺应自然、社会和人类客观规律去做事;无论一点儿说,就是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。冯友兰先生说,德就是“就其所居之位,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。作为一个社会人,要做与自己身份的(也就是“所居之位”)相符(即“应该做的”)的事情,就应该尽到做人、尽责、为人之德。如果不能尽责、尽德,显然是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,起码是没有做到或没有做好“自己应该做的事情”。所以,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,“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,并非只是做或做了即可,更重要的是必须要做好。

对于此,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早就给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“胜任愉快”。把这么好的一个成语和酷吏放在一起,确实有点儿不般配,但是,司马迁有马迁的理由,估计他也没有想到后人会那么看重它。在中国历史上,司马迁首先为酷吏立传的先例,认为汉景帝时期,“吏治若救火拯溺,非徒酷吏酷,能胜其任而愉快乎!”意思是说,要想扭转当时的局面,只有酷吏才有可能胜任其职。所谓酷吏,各有优劣,“其廉者足以表仪,其污者殆酷道也。”一切奸邪,亦质有文武焉。虽酷,称其位矣。”就是说,其中清廉的足以作为表率,其中污浊的或有战略教化,或果敢镇压奸恶,也有文武方略之分。他们虽然残酷,但是都能称职尽责。所以,他才为酷吏立传。

胜任愉快,是指有能力担当某项任务或工作,并能以此为快乐,将其做好。也就是孔子说的:“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(《论语·雍也第六》)喜爱的比不上以此为乐趣的。担当一项任务或工作,首先要称职,然后还要以此为乐,只有这样才可能越做越快乐,乐此不疲。试想如果是一个不喜欢做这件事情能做一件事情而不痛苦,那么这是做好不这件事情的,更不可能胜任其事。只有以此为乐的人,才能够顺应自然和人之真善美的本性用心地去做这件事情,必然也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普遍的快乐。所以,对于工作的胜任,既既己又利

前面说过,德就是顺应自然、社会和人类客观规律去做事;无论一点儿说,就是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。冯友兰先生说,德就是“就其所居之位,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。作为一个社会人,要做与自己身份的(也就是“所居之位”)相符(即“应该做的”)的事情,就应该尽到做人、尽责、为人之德。如果不能尽责、尽德,显然是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,起码是没有做到或没有做好“自己应该做的事情”。所以,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,“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,并非只是做或做了即可,更重要的是必须要做好。

对于此,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早就给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“胜任愉快”。把这么好的一个成语和酷吏放在一起,确实有点儿不般配,但是,司马迁有马迁的理由,估计他也没有想到后人会那么看重它。在中国历史上,司马迁首先为酷吏立传的先例,认为汉景帝时期,“吏治若救火拯溺,非徒酷吏酷,能胜其任而愉快乎!”意思是说,要想扭转当时的局面,只有酷吏才有可能胜任其职。所谓酷吏,各有优劣,“其廉者足以表仪,其污者殆酷道也。”一切奸邪,亦质有文武焉。虽酷,称其位矣。”就是说,其中清廉的足以作为表率,其中污浊的或有战略教化,或果敢镇压奸恶,也有文武方略之分。他们虽然残酷,但是都能称职尽责。所以,他才为酷吏立传。

前面说过,德就是顺应自然、社会和人类客观规律去做事;无论一点儿说,就是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。冯友兰先生说,德就是“就其所居之位,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。作为一个社会人,要做与自己身份的(也就是“所居之位”)相符(即“应该做的”)的事情,就应该尽到做人、尽责、为人之德。如果不能尽责、尽德,显然是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,起码是没有做到或没有做好“自己应该做的事情”。所以,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,“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,并非只是做或做了即可,更重要的是必须要做好。

对于此,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早就给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“胜任愉快”。把这么好的一个成语和酷吏放在一起,确实有点儿不般配,但是,司马迁有马迁的理由,估计他也没有想到后人会那么看重它。在中国历史上,司马迁首先为酷吏立传的先例,认为汉景帝时期,“吏治若救火拯溺,非徒酷吏酷,能胜其任而愉快乎!”意思是说,要想扭转当时的局面,只有酷吏才有可能胜任其职。所谓酷吏,各有优劣,“其廉者足以表仪,其污者殆酷道也。”一切奸邪,亦质有文武焉。虽酷,称其位矣。”就是说,其中清廉的足以作为表率,其中污浊的或有战略教化,或果敢镇压奸恶,也有文武方略之分。他们虽然残酷,但是都能称职尽责。所以,他才为酷吏立传。

前面说过,德就是顺应自然、社会和人类客观规律去做事;无论一点儿说,就是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。冯友兰先生说,德就是“就其所居之位,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。作为一个社会人,要做与自己身份的(也就是“所居之位”)相符(即“应该做的”)的事情,就应该尽到做人、尽责、为人之德。如果不能尽责、尽德,显然是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,起码是没有做到或没有做好“自己应该做的事情”。所以,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,“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,并非只是做或做了即可,更重要的是必须要做好。

对于此,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早就给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“胜任愉快”。把这么好的一个成语和酷吏放在一起,确实有点儿不般配,但是,司马迁有马迁的理由,估计他也没有想到后人会那么看重它。在中国历史上,司马迁首先为酷吏立传的先例,认为汉景帝时期,“吏治若救火拯溺,非徒酷吏酷,能胜其任而愉快乎!”意思是说,要想扭转当时的局面,只有酷吏才有可能胜任其职。所谓酷吏,各有优劣,“其廉者足以表仪,其污者殆酷道也。”一切奸邪,亦质有文武焉。虽酷,称其位矣。”就是说,其中清廉的足以作为表率,其中污浊的或有战略教化,或果敢镇压奸恶,也有文武方略之分。他们虽然残酷,但是都能称职尽责。所以,他才为酷吏立传。

前面说过,德就是顺应自然、社会和人类客观规律去做事;无论一点儿说,就是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。冯友兰先生说,德就是“就其所居之位,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。作为一个社会人,要做与自己身份的(也就是“所居之位”)相符(即“应该做的”)的事情,就应该尽到做人、尽责、为人之德。如果不能尽责、尽德,显然是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,起码是没有做到或没有做好“自己应该做的事情”。所以,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,“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,并非只是做或做了即可,更重要的是必须要做好。

对于此,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早就给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“胜任愉快”。把这么好的一个成语和酷吏放在一起,确实有点儿不般配,但是,司马迁有马迁的理由,估计他也没有想到后人会那么看重它。在中国历史上,司马迁首先为酷吏立传的先例,认为汉景帝时期,“吏治若救火拯溺,非徒酷吏酷,能胜其任而愉快乎!”意思是说,要想扭转当时的局面,只有酷吏才有可能胜任其职。所谓酷吏,各有优劣,“其廉者足以表仪,其污者殆酷道也。”一切奸邪,亦质有文武焉。虽酷,称其位矣。”就是说,其中清廉的足以作为表率,其中污浊的或有战略教化,或果敢镇压奸恶,也有文武方略之分。他们虽然残酷,但是都能称职尽责。所以,他才为酷吏立传。

前面说过,德就是顺应自然、社会和人类客观规律去做事;无论一点儿说,就是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。冯友兰先生说,德就是“就其所居之位,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。作为一个社会人,要做与自己身份的(也就是“所居之位”)相符(即“应该做的”)的事情,就应该尽到做人、尽责、为人之德。如果不能尽责、尽德,显然是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,起码是没有做到或没有做好“自己应该做的事情”。所以,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,“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,并非只是做或做了即可,更重要的是必须要做好。

对于此,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早就给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“胜任愉快”。把这么好的一个成语和酷吏放在一起,确实有点儿不般配,但是,司马迁有马迁的理由,估计他也没有想到后人会那么看重它。在中国历史上,司马迁首先为酷吏立传的先例,认为汉景帝时期,“吏治若救火拯溺,非徒酷吏酷,能胜其任而愉快乎!”意思是说,要想扭转当时的局面,只有酷吏才有可能胜任其职。所谓酷吏,各有优劣,“其廉者足以表仪,其污者殆酷道也。”一切奸邪,亦质有文武焉。虽酷,称其位矣。”就是说,其中清廉的足以作为表率,其中污浊的或有战略教化,或果敢镇压奸恶,也有文武方略之分。他们虽然残酷,但是都能称职尽责。所以,他才为酷吏立传。

胜任愉快,是指有能力担当某项任务或工作,并能以此为快乐,将其做好。也就是孔子说的:“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(《论语·雍也第六》)喜爱的比不上以此为乐趣的。担当一项任务或工作,首先要称职,然后还要以此为乐,只有这样才可能越做越快乐,乐此不疲。试想如果是一个不喜欢做这件事情能做一件事情而不痛苦,那么这是做好不这件事情的,更不可能胜任其事。只有以此为乐的人,才能够顺应自然和人之真善美的本性用心地去做这件事情,必然也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普遍的快乐。所以,对于工作的胜任,既既己又利

前面说过,德就是顺应自然、社会和人类客观规律去做事;无论一点儿说,就是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。冯友兰先生说,德就是“就其所居之位,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。作为一个社会人,要做与自己身份的(也就是“所居之位”)相符(即“应该做的”)的事情,就应该尽到做人、尽责、为人之德。如果不能尽责、尽德,显然是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,起码是没有做到或没有做好“自己应该做的事情”。所以,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,“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,并非只是做或做了即可,更重要的是必须要做好。

对于此,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早就给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“胜任愉快”。把这么好的一个成语和酷吏放在一起,确实有点儿不般配,但是,司马迁有马迁的理由,估计他也没有想到后人会那么看重它。在中国历史上,司马迁首先为酷吏立传的先例,认为汉景帝时期,“吏治若救火拯溺,非徒酷吏酷,能胜其任而愉快乎!”意思是说,要想扭转当时的局面,只有酷吏才有可能胜任其职。所谓酷吏,各有优劣,“其廉者足以表仪,其污者殆酷道也。”一切奸邪,亦质有文武焉。虽酷,称其位矣。”就是说,其中清廉的足以作为表率,其中污浊的或有战略教化,或果敢镇压奸恶,也有文武方略之分。他们虽然残酷,但是都能称职尽责。所以,他才为酷吏立传。

前面说过,德就是顺应自然、社会和人类客观规律去做事;无论一点儿说,就是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。冯友兰先生说,德就是“就其所居之位,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。作为一个社会人,要做与自己身份的(也就是“所居之位”)相符(即“应该做的”)的事情,就应该尽到做人、尽责、为人之德。如果不能尽责、尽德,显然是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,起码是没有做到或没有做好“自己应该做的事情”。所以,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,“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,并非只是做或做了即可,更重要的是必须要做好。

对于此,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早就给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“胜任愉快”。把这么好的一个成语和酷吏放在一起,确实有点儿不般配,但是,司马迁有马迁的理由,估计他也没有想到后人会那么看重它。在中国历史上,司马迁首先为酷吏立传的先例,认为汉景帝时期,“吏治若救火拯溺,非徒酷吏酷,能胜其任而愉快乎!”意思是说,要想扭转当时的局面,只有酷吏才有可能胜任其职。所谓酷吏,各有优劣,“其廉者足以表仪,其污者殆酷道也。”一切奸邪,亦质有文武焉。虽酷,称其位矣。”就是说,其中清廉的足以作为表率,其中污浊的或有战略教化,或果敢镇压奸恶,也有文武方略之分。他们虽然残酷,但是都能称职尽责。所以,他才为酷吏立传。

前面说过,德就是顺应自然、社会和人类客观规律去做事;无论一点儿说,就是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。冯友兰先生说,德就是“就其所居之位,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。作为一个社会人,要做与自己身份的(也就是“所居之位”)相符(即“应该做的”)的事情,就应该尽到做人、尽责、为人之德。如果不能尽责、尽德,显然是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,起码是没有做到或没有做好“自己应该做的事情”。所以,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,“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,并非只是做或做了即可,更重要的是必须要做好。

对于此,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早就给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“胜任愉快”。把这么好的一个成语和酷吏放在一起,确实有点儿不般配,但是,司马迁有马迁的理由,估计他也没有想到后人会那么看重它。在中国历史上,司马迁首先为酷吏立传的先例,认为汉景帝时期,“吏治若救火拯溺,非徒酷吏酷,能胜其任而愉快乎!”意思是说,要想扭转当时的局面,只有酷吏才有可能胜任其职。所谓酷吏,各有优劣,“其廉者足以表仪,其污者殆酷道也。”一切奸邪,亦质有文武焉。虽酷,称其位矣。”就是说,其中清廉的足以作为表率,其中污浊的或有战略教化,或果敢镇压奸恶,也有文武方略之分。他们虽然残酷,但是都能称职尽责。所以,他才为酷吏立传。

前面说过,德就是顺应自然、社会和人类客观规律去做事;无论一点儿说,就是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。冯友兰先生说,德就是“就其所居之位,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。作为一个社会人,要做与自己身份的(也就是“所居之位”)相符(即“应该做的”)的事情,就应该尽到做人、尽责、为人之德。如果不能尽责、尽德,显然是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,起码是没有做到或没有做好“自己应该做的事情”。所以,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,“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,并非只是做或做了即可,更重要的是必须要做好。

对于此,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早就给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“胜任愉快”。把这么好的一个成语和酷吏放在一起,确实有点儿不般配,但是,司马迁有马迁的理由,估计他也没有想到后人会那么看重它。在中国历史上,司马迁首先为酷吏立传的先例,认为汉景帝时期,“吏治若救火拯溺,非徒酷吏酷,能胜其任而愉快乎!”意思是说,要想扭转当时的局面,只有酷吏才有可能胜任其职。所谓酷吏,各有优劣,“其廉者足以表仪,其污者殆酷道也。”一切奸邪,亦质有文武焉。虽酷,称其位矣。”就是说,其中清廉的足以作为表率,其中污浊的或有战略教化,或果敢镇压奸恶,也有文武方略之分。他们虽然残酷,但是都能称职尽责。所以,他才为酷吏立传。

前面说过,德就是顺应自然、社会和人类客观规律去做事;无论一点儿说,就是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。冯友兰先生说,德就是“就其所居之位,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。作为一个社会人,要做与自己身份的(也就是“所居之位”)相符(即“应该做的”)的事情,就应该尽到做人、尽责、为人之德。如果不能尽责、尽德,显然是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,起码是没有做到或没有做好“自己应该做的事情”。所以,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,“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,并非只是做或做了即可,更重要的是必须要做好。

对于此,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早就给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“胜任愉快”。把这么好的一个成语和酷吏放在一起,确实有点儿不般配,但是,司马迁有马迁的理由,估计他也没有想到后人会那么看重它。在中国历史上,司马迁首先为酷吏立传的先例,认为汉景帝时期,“吏治若救火拯溺,非徒酷吏酷,能胜其任而愉快乎!”意思是说,要想扭转当时的局面,只有酷吏才有可能胜任其职。所谓酷吏,各有优劣,“其廉者足以表仪,其污者殆酷道也。”一切奸邪,亦质有文武焉。虽酷,称其位矣。”就是说,其中清廉的足以作为表率,其中污浊的或有战略教化,或果敢镇压奸恶,也有文武方略之分。他们虽然残酷,但是都能称职尽责。所以,他才为酷吏立传。

胜任愉快,是指有能力担当某项任务或工作,并能以此为快乐,将其做好。也就是孔子说的:“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(《论语·雍也第六》)喜爱的比不上以此为乐趣的。担当一项任务或工作,首先要称职,然后还要以此为乐,只有这样才可能越做越快乐,乐此不疲。试想如果是一个不喜欢做这件事情能做一件事情而不痛苦,那么这是做好不这件事情的,更不可能胜任其事。只有以此为乐的人,才能够顺应自然和人之真善美的本性用心地去做这件事情,必然也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普遍的快乐。所以,对于工作的胜任,既既己又利

前面说过,德就是顺应自然、社会和人类客观规律去做事;无论一点儿说,就是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。冯友兰先生说,德就是“就其所居之位,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。作为一个社会人,要做与自己身份的(也就是“所居之位”)相符(即“应该做的”)的事情,就应该尽到做人、尽责、为人之德。如果不能尽责、尽德,显然是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,起码是没有做到或没有做好“自己应该做的事情”。所以,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,“做自己应该做的事”,并非只是做或做了即可,更重要的是必须要做好。

对于此,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早就给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“胜任愉快”。把这么好的一个成语和酷吏放在一起,确实有点儿不般配,但是,司马迁有马迁的理由,估计他也没有想到后人会那么看重它。在中国历史上,司马迁首先为酷吏立传的先例,认为汉景帝时期,“吏治若救火拯溺,非徒酷吏酷,能胜其任而愉快乎!”意思是说,要想扭转当时的局面,只有酷吏才有可能胜任其职。所谓酷吏,各有优劣,“其廉者足以表仪,其污者殆酷道也。”一切奸邪,亦质有文武焉。虽酷,称